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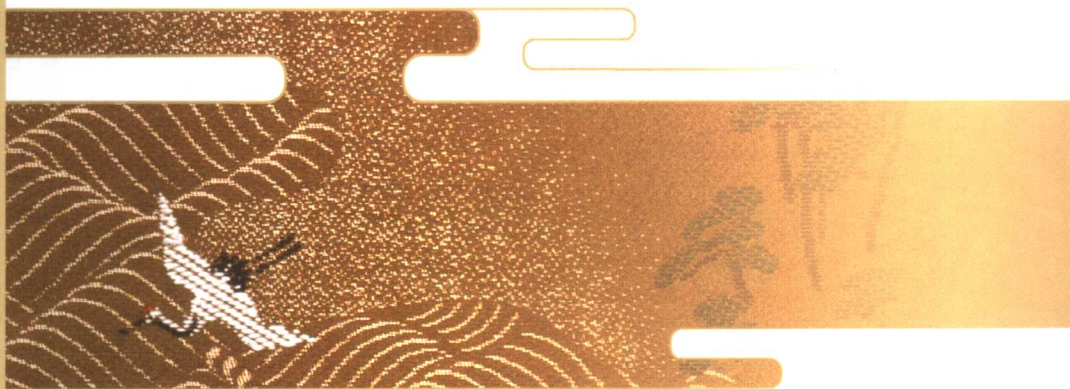
日本中國學文庫

王晓平◎主编

王维研究 (节译本)

〔日〕入谷仙介◎著

卢燕平◎译



中華書局



日本中國學文庫

王晓平◎主编

王维研究 (节译本)

〔日〕入谷仙介◎著

卢燕平◎译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维研究/(日)入谷仙介著;卢燕平译. - 北京:中华书局,2005

(日本中国学文萃/王晓平主编)

ISBN 7-101-04626-6

I. 王… II. ①入…②卢… III. ①王维(701?~761) - 文学研究②王维(701?~761) - 人物研究
IV. ①I206.2②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8304 号

-
- | | |
|-------|--|
| 书 名 | 王维研究(节译本) |
| 丛 书 名 | 日本中国学文萃 |
| 著 者 | (日)入谷仙介 |
| 译 者 | 卢燕平 |
| 责任编辑 | 齐浣心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05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 字数 233 千字 |
| 印 数 | 1-4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7-101-04626-6/I·610 |
| 定 价 | 24.00 元 |
-

总 序

王晓平

日本人(包括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迁徙到列岛的人们及其后裔),至少从我国南北朝时代便揭开了研读中国典籍的历史,而伴随中国文化进入日本所产生的一系列文化现象,诸如写经抄书、创造假名、官中讲经、发明训读、朗咏流行、设明经文章诸科博士、藏典修史等等,构成了人类文化交流史上壮观的奇景。日本人审视中国的同时,也在成就着自身。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从广义上讲,日本人研究中国,几乎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岁月,但学界真正把研究中国的学问称为“中国学”,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

长达一千五百年以上的中国研究史,是与日本文化的开创和发展紧密联系的。尤其在近代以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完全抛开中国学术史,便没有完整的日本学术史可言。但是,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研究中国的目的方法和态度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尽管中国传统的考据学、文献学的影响依然存在,但与西方学术同时也与本土固有文化研究建立的联系,远比与中国同时学术的联系敏感、紧密而又牢固。不论如何,从古至今,日本学界产生了众多研究中国的大学问家和名文名著。

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与中国自身的学术研究最大的不同,就



是主导这门学问的根本课题,是岛国日本如何面对大陆中国。它们不仅植根于异质的文化土壤,从属于日本文化体系,反映或者作用于当时日本的包括民族主义思潮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在日本学界获取评价,而且根本目标在于发展日本文化。所以尽管它们有时与中国本土学问面临着同一对象,然而两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和价值。

在世界文化走出各自分割历史阶段的今天,国外中国学与中国的国学共同构成世界的学术中国观,而又各属不同的学术体系,发挥着不同的文化功能。对于我们的国学来说,国外的中国学可以说是不宜回避的“他者”,日本的中国学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进一步说,日本中国学除了具有其他国家中国学的共性之外,还有一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离不开一个“近”字。例如,由于许多业已散佚的中国文献通过抄本或者刻本保存在日本,使得日本成为域外最重要的中国文献资料库之一;又比如日本拥有传统的阅读和训释中国文学的特殊手段等等,这给中国文献的传播和解读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同时,由于中日两国学术交流源远流长,日本中国学与日本学研究的关系特别紧密,也使得它在考据和比较研究这两方面,有着更多的资源和课题。

在日本,对日本古代学术文化的研究,常常不能与对中国的研究一刀两断,再加上现代学术谋求沟通的大趋势,便使得日本中国学者,例如内藤湖南、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人的著述的影响超出了中国学的范围;另一方面,某些研究日本学的著述,例如明治时代的民俗学家、最早的环境保护运动力行者南方熊楠,有“知识巨人”、“时代代言人”之称的加藤周一,“文化功劳者”称号获得者



中西进等人著述中涉及到中国学的部分,也都有一读的价值。

日本近代以来在某些研究条件或手段上不同于中国本土,日本学人多重实闻亲见,不尚空谈,长于细读深究。他们在某些领域,例如中国宗教文化、敦煌文学、中外关系史、艺术史以及中国戏曲小说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曾给中国学人以启迪。日本从奈良、平安时代起逐渐形成一些接受中国文学的热点,如《文选》、《白氏文集》、《唐诗选》、《古文真宝》等,对这些作品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成果,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有着互补互鉴的作用。这些都使得中国学者对日本中国学报以热眼。学人多以“他山之石”、“邻壁之光”来强调这种关注的借鉴意义。

与此同时,中国学术界又从很早便有了对盲目追随日本学人态度的批评。早年章太炎先生对这种态度给予的辛辣讽刺,虽不免言之有偏,却仍不失警戒之功。前辈学者对于当年那些所谓“支那通”的揭露,更不该忘记。在中国学者对日本中国学展开系统研究的时候,仍有必要反对任何形式的食而不化与人云亦云现象,强调中国学研究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统一,葆有学术自信和识别眼力。

今天,更要看透那些变样翻炒“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的所谓“中国通”,他们往往将历史和现实作短线连接,凭借现代媒体和出版业,朝论夕改,张大偏见,仅就学术手法而言,也实不足为训。应该说,这些人虽然不是日本中国学界的主流,但是他们头上也顶着“大牌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和“社会名流”的帽子,近年来忙不迭煽乎所谓“厌中”(讨厌中国)情感,就很有些拉着舆论走的能量。

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我们对日本中国学研究的价值,绝不



止于“借鉴”，也不应该停留在“此优彼劣”的结论上。对日本来说，日本中国学是日本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从整体上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某一时期的日本人的中国观、中国形象、中日关系。日本的知识界，往往通过它们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研究中国的专家们，以及有些并非专门研究中国的思想者写的关于中国的著述，对短期或者较长期的社会思潮，有时甚至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都起过某种作用。言说中国的学术话语与官方话语、媒体话语及民间话语等共同营造着中国形象，而其中学术话语的影响则更为长久深远。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学人来说，通过这些著作来了解日本文化、认识日本人、解读日本人的中国观，或许也不失为一条途径。同是，我们对日本社会文化看得越透彻，就可以对日本中国学研究得更为深入。

总之，在中日文化双方不能不互相正视的今天，对待格外重视师承流派、积淀深厚、做派繁复、多变多样的日本中国学来说，草草一瞥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原始察终，辨源析流，叩同问异，进而学会平等地与其展开卓有成效的学术对话。既是对话，那当然不是只“知己”就行了，还必须“知彼”，而且不是一般的“知”，而是要深知熟稔。所幸我们已经有了《日本中国学史》、《日本汉学史》等专门的著述，让我们看到了日本中国学乃至国际中国学研究的广阔前景。

国际文化交流发展到今天，在人们对吸收外来文化倾注着空前热情的时代，面对别种文化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显出更大的必要性。这种声音，不是自说自话，而要有往有复。因而，加强对国际中国学的研究，必然会与我们的“中国学”走向世界相联系。在这



一方面,日本学界可谓先行一步。为了推进国外的日本学研究,十多年以前,日本便建立了对外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最近又在法政大学中设立了国外日本学研究基地,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对国际日本学研究展开分析。以此反观我国知识界的一般认识,有些人多只看到那些操着怪腔怪调汉语的外国人在该国学界没成什么大气候,又爱发些对中国隔靴搔痒的议论,就轻看国际中国学研究的意义。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工作的紧迫性。

读书或可睹人。推进学术交流,化解误解误读,减少文化摩擦,出书、读书、品书与人员交流对话,是有力的两翼。我们阅读日本中国学著述的时候,如果不只停留在听他们述说什么,而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会那样说,和同时期中国本土研究有哪些不同,那么,这些材料就可能演化为我们拓展本土文化研究和外国文化研究两大领域更有用的思想资源。

对于收藏在日本的中国文献,日本学者已经对文本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但我国学者却常因为无法与原件谋面而深感遗憾。有些日本学者抱怨中国学者对日本存藏的中国文献抄本、刻本评价过低,而实际原因是这些资料一般中国学者很难看到。面对涉及各类学科的日本中国学著述,切实了解它们的最好方法无疑是阅读原著,而且是系统阅读,因为翻译有时难免会模糊两种文化的细微差异。然而,在很多有兴趣的学人还没有条件做到这一点的时候,翻译就显示着特殊的必要性。

我们选择一些篇幅不长、适于阅读的名篇名著、新人新作介绍给读者,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日本中国学的多种面孔。我们在坚持学术规范的同时,也不应排斥学术研究的个性化与多样化,这些研究和写作方法的异色,或许能帮助我们扩大眼界。



我们这套丛书,没有选择像斯波六郎所著《文选李善注所引古文尚书考证》,或者太田次郎所著《以旧抄本为中心的白氏文集本文的研究》那样大部头的学术价值很高而读者面却很窄的学术专著。那样的书很重要,等条件具备,也应该译介过来。我们先要做的,是希望读者能认识一批比较好接近的客人,也就是一批学者为非中国学专业知识分子写的书。

日本一些研究中国学的名家,很重视为一般读者写书。吉川幸次郎曾提出让学问回归大众的口号,白川静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也强调在孤诣独往苦苦求索的同时,要努力使学问返回到“一般”,即回报于社会。像青木正儿等人文笔之好,在学界早有定评,他们关于中国文化的学术随笔脍炙人口,几十年来一直是书店的常销书。

我们选择的书目,除了几部新人新著外,都是“大家”写的“小书”。或侧重其保留中国文献资料的价值,或侧重对中国本土研究的补阙,或侧重于对中日关系研究的历史作用,或侧重于其在日本学界的影响。取其一点,不必求全,积少成多,不拘一格,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通过这套丛书,读者便可陆续与那些久闻其名而未见其文的好友见面,共享日本中国学之景观。

序 言

嵌在碧蓝色大海中的关西国际机场的西边，有一座绿阴覆盖的美丽岛屿，这就是濑户内海中最大的岛屿——淡路岛。1933年，入谷仙介博士就出生于这个岛的淡路市，1952年他考入京都大学前的青少年时代都在这里度过。当时，在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研究室主持工作的是著名的吉川幸次郎博士和小川环树博士，众多的学生仰慕二位先生高名及其务实求新的学术氛围，汇集到了这里。入谷先生考进了研究生院，在吉川、小川二位先生的严格指导下，和众多学子一起开始了切磋探讨的学者生活道路。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因为中日邦交尚未正常化，日本国内开设汉语和中国文学课程的大学很少。因此，先生毕业后的就业问题一时成为难事，听说一段时间不得不靠担任中学教师的妻子的一点收入维持家计，然而先生以自己的研究水平终于得到学界认可，成为岛根大学的副教授。

鲁迅先生的日本友人增田涉先生也曾在岛根大学任教，而学校的中国文学研究室在入谷先生来校前处于被废止的停滞状态。入谷先生到任后，恢复了这个有传统的研究室的工作。后来，他转往山口大学任教，直至退休。岛根大学所处的松江市据说因为和中国的松江很像而得名，是一个面对日本海的幽静的文化城市。山口大学所在的山口市和鹿儿岛，都因是明治维新骨干人物的故



乡而闻名。此前 14 世纪到 16 世纪统治这里的大内氏,因和中国的贸易往来而致富,以京都为蓝本设计了这座城市。先生在这风光明媚历史悠久的两个都市送走了他的教育和研究生涯,他为之花费了二十年心血的岛根大学授予了他名誉教授的称号。

先生以王维研究为主,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他的研究范围很广泛。先生的研究内容大体可分为三个方面:以王维为中心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有关《西游记》的民间小说研究、以江户时代为中心的汉诗文学作品研究。从先生的著作《古诗选》(朝日新闻社,1966 年)、《宋诗选》(朝日新闻社,1967 年)、《高启》(岩波书店,1962 年)等来看,研究对象的时间跨度从《诗经》时代直至隋炀帝,可见研究领域之广。王维是他的主要研究对象,然而先生的毕业论文选题竟是关涉《西游记》的。实际上先生自从翻译了《西游记》(筑波书房,1968 年)以后,一直对这部作品抱有浓厚的兴趣,他后来在《〈西游记〉的神话学》(中央公论社,1997 年)中,用比较神话学的方法,对这部作品作了新颖的解释。先生晚年致力于日本汉诗文作品的研究,以《赖山阳·梁川星岩》(岩波书店,1990 年)为首,除了全力介绍江户时代的汉诗作家和作品外,也关注到明治时代的本土汉诗作者,出版了《近代文学中的明治汉诗》(研文出版,1989 年),这是确立了汉诗在日本文学中地位的一部力作。先生通过多年研究坚持认为,汉诗文学作品在日本文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部论文集就是论证了这一主张的划时代之作。形成先生这一观点的契机,可能是发现了活动延续到昭和初期的岛根县的汉诗社团——“剪淞吟社”的资料。和当代日本人的教养内容不同,至少到明治、大正时期,中国古典文学一直作为日本人教养因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不仅岛根县,日本全国很



多地方都有汉诗社团(吟社),报纸有汉诗栏,普通人们都纷纷投稿参与。先生通过考察这个吟社的盛衰,对汉诗文怎样作为日本文学的样式之一在本土文学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又怎样退出日本文学史这一轨迹,进行了充分的论证。他临终前仍手不释笔,基于对这个吟社的考察写成了他平生最后一篇论文《山阴的近代汉诗》。

作为以上所述多方面研究成果的基础的,是先生的“读万卷书”。先生原本非常喜欢读书,在淡路岛,流传有他走访亲戚整整一天不出书房以及边骑车边看书等逸事。我也曾在校园里见过他边走路边看书的身影,他那边走边有时抬头矫正方向的样子,不免让人感到有点滑稽,同时对他的爱书精神油然而生敬佩之情。先生说:“只要一摘掉助听器,我在哪里都能看书学习。”上研究生时,他去学校坐电车要花两个小时,途中便成了他看书的好时光。一位曾在电车上见过他专心读书情形的教授对吉川先生说:“电车里有一位勤奋读书的中国文学专业的学生。”我曾在大学节庆祝活动的喧闹日子里,见到在研究室中不戴助听器专心读书的先生的身影,他那学者风范和治学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

先生是勤奋的读书家,但决非固守书斋之人。他在中国山东大学作访问学者时,用有限的访学时间,以辋川庄遗迹为首,考察了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许多地方,追踪了古代诗作中的许多山水旅程。他把这些体验写成了《阳关无故人——老留学生的汉诗之旅》(筑摩书房,1995年)。

毋庸赘言,先生是一位出色的研究家,而他也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先生的教育理念一言以蔽之,是培养有良好教养的人。他对我们一字一句细致耐心地讲解中国古典诗文,还在中国古典文



学的课堂教学中融合进日本、中国有关最新研究成果的介绍。他的课明晰易懂,努力使学生们从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的角度去把握作品,认识其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从而有尽可能广阔的视野。他的课决不流于观点陈述,而是有着涵括中国神话时代到当代、日本文学和欧美文学的超越时空的丰富内容。

七十岁时完全失聪的先生,尽管研究和教育工作异常繁忙,但依然热心致力于听力障碍者的福利运动,为成立松江市听力障碍者协会和全国听力障碍者协会尽心竭力。为了改善这些人的生存环境和条件,他向听力障碍者乃至全社会发出了积极的呼吁。关于此项运动应该有比我更合适的评价者,故此不赘。

先生喜欢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的格言:“读书使一个人有更多的人生体验。”这句话正适合于先生自身。作为研究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先生度过了可与数个常人媲美的充实生涯。他没有提出在自己身后举行追悼活动的愿望,但是先生的友人、学生、听力障碍者运动的共同者以及更多的人们,不分行业范围地为他自发地举行了大规模的悼念活动、结集了悼念他的纪念文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正适用于先生。

这里译出的,只是先生诸多研究成果中的一部分,然而相信从一斑中已可窥见全豹。先生平生希望并积极进行跨越国境的学术交流,这部节译本应该会使他感到欣慰。

入谷先生弟子、日本京都大学副教授

道坂昭广

2004年8月于日本京都大学

目 次

序言	1
第一章 少年时代	1
第二章 王维的乐府	36
第三章 王维的不遇感	59
第四章 送别	88
第五章 周围的人们	111
第六章 自然	186
第七章 辋川	220
第八章 晚年的王维	257
附 录 关于王维的应制诗	303
王维诗的声音表现	319
译后记	332

第一章 少年时代

一

关于王维的家世,《新唐书》(《新唐书》卷七二中《宰相世系表·河东王氏》)有载。他的弟弟是唐代第八代君主代宗的宰相。唐代朝廷按照惯例,对尊崇宰相等高官和出身名门者的家谱都有详细记录。但是,王维家谱中只有他的父祖四代以及兄弟五人的名字。现列其家世如下:

赵州司马王儒贤——扬州司马王知节——协律郎王
胄^①——汾州司马王处廉——尚书左丞^②王维字摩诘、代宗宰
相王缙字夏卿、江陵少尹王缙、王紘、太常少卿王统。

由上可见,王维的父祖辈中,除王胄一人外,其他三人的任官都止于州司马。司马是州的副知事,官品依州而异,大致为从五品下到正六品下。总之这一家族除了产生过一位天才诗人外,和中国封建社会无数压抑在贵族之下、辗转于乡县的小官僚出身的士族没有什么两样。然而,他们所属的士族阶层当时正在逐渐抬头。

关于王维的出生地,《旧唐书》本传说:



太原祁人。父处廉,终汾州司马,徙家于蒲,遂为河东人。

与祁同名的县约在今山西省中部。当时叫并州,开元以后是太原府的属县。汾州即今汾阳县,位于祁县西。“蒲”在山西省有两处,一是平阳西边的蒲县,地处黄河东岸的高原地带,是远离交通干线的僻壤。另一个是蒲州,即今山西省永济县。离开潼关沿着山陕两省边界一路东下的黄河,在这里陡然东转,奔向河南大平原,永济县就在黄河拐角的内侧,在唐代称河东县,又称河中府。蒲县位置靠近祁县和汾州,故这里的“蒲”应该指蒲州。河东县是蒲州州治所在县。对王缙的籍贯,《旧唐书》本传说是“河中人”,《新唐书》本传也说是“本太原祁人,后客河中”。从《新唐书》本传的字面看,似乎王缙成人以后才移居蒲州,其实那里是他们父辈移居后的落脚点、王维兄弟的出生地。

蒲州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唐代成为要塞。隋唐换代之际,隋将屈突通、尧君素、王行本等曾在这里坚守,使唐军难以前进。安史之乱时,这里也屡屡成为必争之地。唐代前半期在蒲州发生的两件事,使这个地方一下子变得不同寻常。一件是贞观三年(629)裴寂(《旧唐书》卷五七《裴寂传》)退隐于此,裴寂是唐高祖李渊的旧友,作为唐初开国元勋之一为世所知。太宗起兵太原时用了他的计策,晚年因事触忤了太宗,名义上回乡隐居,实际上是被从宫中放还。另一件事发生在睿宗景云二年(711)(《资治通鉴》卷二一〇景云二年二月至五月)王维十三岁时,也许年少的王维也曾耳闻目睹,当时,因为倒韦后、拥立睿宗复位的功臣太子隆基(后来的玄宗),和唐睿宗的妹妹、则天武后的爱女太平公主之间的明争暗斗日益加剧,睿宗不得已让太平公主在蒲州暂避一时。皇帝的郁结很快消解,但是争斗并未就此了结。翌年太子发动政



变,太平公主被杀,武后以来的女性政治时代告终。蒲州因位于潼关之外而被视为天子膝下,又是连接长安、洛阳两都的中介,受这些都会的风气影响,又作为唐朝的发祥地和北方的边防重镇,连接首都长安和朝廷重地太原的要地,在当时相当繁荣。

有关王维家世的资料虽然匮乏,但联系从祁县往蒲州的迁移以及系谱来看,这是一个积极靠拢中央政权及官方文化的家族。如前所述,南北朝以来的门阀万能风气虽然表面上仍然很盛,内里却日益走向颓波伏流。不难想像长期压抑的中小地主阶层在终于有了希望后亟欲扬眉吐气的势头,然而他们的进路并非一帆风顺。依然占据社会上层的贵族们当然不肯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利,这正是唐代中小地主阶层的矛盾和苦恼所在。夸张一点的话可以说,有唐一代的辉煌诗歌,正发自这个阶层的矛盾和自身境遇。可以想像王维家族在这一大潮中,为了振兴门庭曾经经过了持续几代怎样的努力。这种努力应该从系谱中第一代的王儒贤就开始了。王儒贤年代不详,从他是武后时人王处廉的曾祖父来看,他可能是隋或唐初人,在隋唐易代的动乱中多少立了些功而得了官。王儒贤和他的后嗣四人中,有三人官只做到州司马,也是因为受家族地位所限,面对一道难以攻破的门第之墙,而从山区的祁县举家迁移到稍靠近首都的繁华地蒲州,应该是出于靠拢中央集权的愿望。

关于王维的祖辈包括他的父亲王处廉,能知道的材料只有这些。王维和弟弟王缙的诗文中从未提过他父亲及其对兄弟二人的影响。可能其父是个平庸的人,而且不长寿,他拥有王维在内的五个儿子和一个女儿^③,看来睿宗朝和玄宗初年时应在世。

王维的母亲是博陵县君崔氏。县君是朝廷给官员的妻子或母亲的封号。这是一位出色的女性,在王维《请施庄为寺表》(《王维